

略论天津“七十二沽”村落群形成史

付红旭 张仁江

提 要：天津地区许多地名都与沽有关，更有“七十二沽”村落群这一独特历史产物。“七十二沽”村落群的形成与自然、历史、社会环境等密切相关。本文系统梳理了“七十二沽”村落群的发展历程，并将其概括为肇始、萌芽、成长、初步形成四个阶段，并详细分析了各历史时期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

关键词：天津 七十二沽 村落群 形成史

一 关于“沽”的研究

天津地区有许多以“沽”为通名的村落，天津的城市发展、人文历史都深受“沽”的影响，因而天津的别称有“津沽”“沽上”“七十二沽”等。“沽”是天津最早的聚落，并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七十二沽”村落群。长期以来各界学者对“沽”文化进行了探讨与研究。早在1944年，侯仁之就探讨了直沽名称之演变以及小直沽和大直沽的发展过程等。^①周汝昌认为“沽”是古代浅水湖泊的名称，历久而形成入海水道，而且认为大直沽早于小直沽出现。^②翟乾祥从农田水利角度研究了海河干流和蓟运河潮汐河道两岸开引水渠，利用潮汐升降自流灌溉、排涝和汲饮的沽道，认为出现在明代的“津门七十二沽”体现了洼改种稻的土地开发寓水利于沽道的特点，所开沽道成为村、镇的通名。^③刘茂国对天津历史沿革、地名文化等作了系统化整理，对“七十二沽”进行了解读，认为“七十二沽”的“沽”不是简单的对自然之水的描述，而是在纵横交错的水网之上，概括出天津人文发展的精彩结点。^④杨大辛认为“七十二沽”中的七十二只是个约数，言其多也。^⑤尹树鹏提出，应该从沽的形成和空间特点来解释天津文化产生的环境源头，依据水文地理的规律来研究沽的形成和定义。^⑥学界对沽文化中有关问题的既有解读与探讨对沽文化研究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但对“七十二沽”村落群的形成历史缺少系统与深入的研究。

在沽文化研究中，专家学者对“沽”字的含义作了详细探讨。最早对天津地区村落名中的“沽”作解释的是清人谈迁，他在《北游录》中写道：“甲寅。发十里丁字沽。盖丁字沽、西沽、直沽。并禹遗迹疏导之处。在武清境内。河形三岔如丁字也。凡海上傍水村落俱曰沽。”^⑦有人

① 参见侯仁之：《我从燕京大学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73—163页。

② 参见周汝昌：《直沽探胜集》，《天津市河东区文史资料》（第6辑），政协天津市河东区委员会，1994年，第9—13页。

③ 参见翟乾祥：《津沽早期农田水利基础措施——七十二沽浅析》，《天津市文史研究馆诗文选集》，天津市文史研究馆，2003年，第259—269页。

④ 参见刘茂国：《天津七十二沽》，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63页。

⑤ 参见杨大辛：《津门古今杂谭》，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9—30页。

⑥ 参见尹树鹏：《沽文化诠释》，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1—14页。

⑦ 谈迁著，汪北平校注：《北游录》，中华书局，1960年，第41—42页。

认为：“沽是河道演变过程中形成的环水高地。”^①《天津地名考》说：“天津以‘沽’为通名的居住地，皆位于海河水系沿岸，为蜿蜒河道中泥沙淤积而逐渐形成的环水高地，且历史悠久，是天津地区最早形成的居民聚落。”^②也有人认为：“沽实际指的是河曲凸岸方向的滩地。”^③《天津》一书中写道：“天津自古有‘七十二沽’之说，沽是一条古河名，沽河故道在今北京市通州区以东，并有东西之分。东沽河即今潮白河、蓟运河等，西沽河即今北运河、海河。所以沿沽河两岸的村庄名称多带有沽字，如三义沽、小直沽、大直沽、塘沽、汉沽等。”^④

以上关于“沽”的种种说法可谓见仁见智，从不同角度解读天津地区村落名中“沽”的含义。然而，这些有关“沽”的种种说法都有局限性：傍水村落并非都是“沽”村落，“沽”村落也并非都是环水高地，也不是天津地区最早的村落；村落建在高处是普遍情况，并非“沽”村落所独有。笔者根据有关历史文献研究，认为“七十二沽”村落群并非短时间内所形成，它的形成和发展有其自然因素，也有政治和经济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其各自成因与特征。

二 “七十二沽”村落群形成的历史

（一）“七十二沽”村落群之肇始：金朝建立的直沽寨

天津地区最早以“沽”为名的聚落是金朝设置的军事据点“直沽寨”。直沽寨位于沽河（北运河）与卫河（南运河）交汇之处的三汉（亦作岔或叉）口附近^⑤，即今天津市海河西岸狮子林桥附近 [见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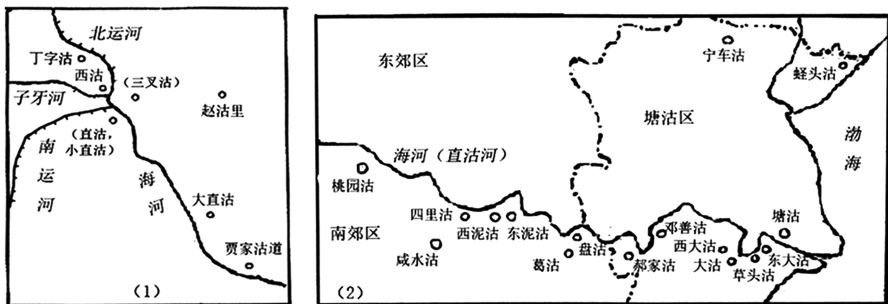


图1 海河（直沽河）沿岸的沽村落

直沽寨的设立见《金史》：“完颜佐本姓梁氏，本为武清县巡检。完颜咬住本姓李氏，为柳口镇巡检。久之，以佐为都统，咬住副之，戍直沽寨。贞祐二年，乱军遣张暉等三人来招佐，佐执之。翌日，刘永昌率众二十人持文书来，署其年曰天赐，佐掷之，麾众执永昌，及暉等并斩之。”^⑥由此记载可知，金朝建立直沽寨的时间应不晚于贞祐二年（1214）。北宋和辽以前的今天津地区没有带“沽”字村落的记载。

三汉口本是一个没有聚落的荒凉之地，金朝为何在三汉口设置直沽寨？这其中既有其地理原

① 谭汝为：《天津方言文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0页。

② 谭汝为：《天津亲水地名考》，《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③ 佚名：《老天津卫的那些地名》，《国学》2013年第4期。

④ 《发现者旅行指南》编辑部：《发现者旅行指南——天津》，旅游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37页。

⑤ 参见侯仁之：《我从燕京大学来》，第82页。

⑥ 《金史》卷103《完颜佐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227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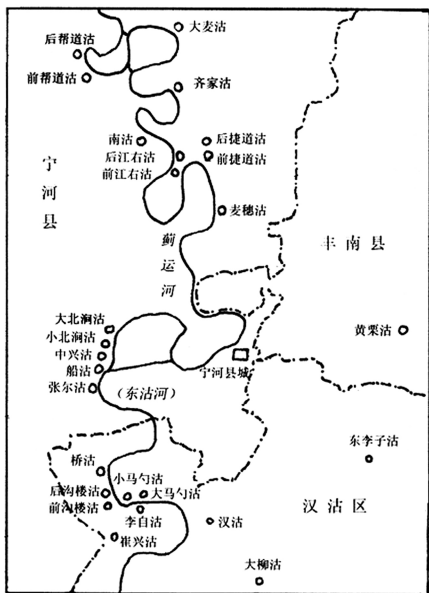


图2 宁河县和汉沽区的沽村落



图3 宝坻县的沽村落

因，也有军事、经济原因。其一，金统一北方后，迁都燕京（今北京）定为中都。为改善通向中都的漕河运输，金章宗于泰和五年（1205）改凿运渠，河北、河南、山东一带的漕粮等物资经南运河、大清河，再经过三汉口转运至中都。经三汉口运往中都的漕粮每年多达170万石以上，因此三汉口成为通往京都的重要漕运枢纽。其二，当时河北一带的乱军起义对金朝统治影响甚大，《金史》中相关记载证实了乱军对金政权的威胁。因此，金廷为维护漕运水路安全及该地有效统治，在三汉口建立军事据点直沽寨，犹如“七十二沽”村落群的一粒种子，是为肇始。

（二）“七十二沽”村落群之萌芽：元代出现的三叉沽、大直沽和小直沽

大直沽、小直沽和三叉沽是三个新的地名，都有一个通名“沽”字，都是源自直沽，可以说开启了以沽为通名的地名之先河。大直沽地名初见于《元史》：“太宗丙申年初于白陵港、三汉口、大直沽等处置司，设熬煎办，每引有工本钱。”^① 为与以前的直沽有区别，由于这里的码头规模大，人们把这里叫做大直沽，而原来的直沽则改叫小直沽，或仍叫直沽。小直沽之名最早见于元程端礼的诗作《舟次小直沽寄覃怀诸君子》。^② 三叉沽因地处三条河的交汇处，因形而得名，在天津市狮子林桥附近。直沽也代表大、小直沽、三叉沽及其附近的较大范围地区。

元朝，直沽地区出现新的发展机遇。首先，元朝定都大都后，发展海运业，三汉口成为漕运中心，直沽寨演变为直沽，成为舟车汇聚、商贾云集的交通枢纽。元代诗人王懋德在《直沽》诗中言：“极目沧溟浸碧天，蓬莱阁楼远相连。东吴转海输粳稻，一夕潮来集万船。”^③ 元张翥《读瀛海喜其绝句清远因口号数诗示九成皆寔意也·其一》诗亦曰：“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罍越布满街衢。”^④

① 《元史》卷94《食货志二》，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2386页。

② 参见《元代史料丛刊》编委会主编：《元代史料丛刊续编·元代文集》，黄山书社，2018年，第106页。

③ 蒋一葵：《长安客话》，北京出版社，2018年，第133页。

④ 张翥：《蜕庵集》卷4《读瀛海喜其绝句清远因口号数诗示九成》（其一），“四部丛刊续编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65页。

这些诗歌反映出直沽当时的繁华景象。其次,由于三汉口附近盛产盐,所以元朝在此设置盐场。随着盐业发展,三叉沽、大直沽和小直沽等地名相继出现。元太宗六年(1234)王鹗的《三叉沽创立盐场碑》记载了三叉沽之地“盐卤涌出,或经日而生”的情形。^①

(三)“七十二沽”村落群之成长:明洪武出现的丁字沽、咸水沽和葛沽等

明洪武初,出现了丁字沽、咸水沽和葛沽等村落(见图1)。《明史》记载:“(洪武)十年五月来属。(静海)县北有小直沽,卫河自西来,与白河合,入于海。又有丁字沽、咸水沽。又北有天津卫,永乐二年十一月置。”^②该记载说明最晚在洪武十年(1377)出现“丁字沽、咸水沽”。明代《三卫志》遗存康熙十七年(1678)修订的《天津卫志》里,对咸水沽表述为“咸水沽去城东南六十里,命名以咸而沽水甜淡”。葛沽之名也是出现在元末明初,“葛沽即北宋的‘蛟脐港铺’,因当时盛产蛤蜊,曾名‘蛤沽’,当地百姓考虑‘蛤沽’字不雅,于1405年前后改称‘葛沽’,为华北‘八大古镇’之一”。又有传说,因沽河滩上葛草丛生,故为“葛沽”^③。

咸水沽和葛沽的出现基于以下原因:第一,元朝定都大都后,开辟海运,南粮北调,每年有大量粮船从南方海运至大沽口进入海河,又经北运河转运至大都,海河中游的今咸水沽和葛沽地处海河尾闾要冲,为海运必经之地,扼水陆交通咽喉。^④第二,元至元二年(1265)、七年,在今葛沽建立丰财、厚财盐场,至元七年在今咸水沽建立兴国、富国盐场,成为元代重要盐场。洪武初,为恢复元末因政治腐败和战争影响遭到严重破坏的河北盐业,明太祖命置北平河间长芦都盐运使司,“设司于沧州(是时已徙治长芦),置场于近海,编户于州县而签民为灶”^⑤。第三,早在宋端拱二年(989)根据沧州节度使何承矩等上书建议,沿海负河一带屯田种稻,后经历代断续经营,到明初,昔日斥卤之地的今葛沽和咸水沽已成为鱼米之乡。^⑥由于该地区的生产生活等活动与沽河密切相关,与当时闻名遐迩的大、小直沽和三叉沽同处于直沽河沿岸,人员和货物往来密切,受其影响而起村落的通名为“沽”。

另外,据传草头沽、东李自沽、大马勺沽、勾楼沽、八道沽和菱角沽等于明初建村。^⑦这些沽村落距离直沽地区稍远。丁字沽、咸水沽和葛沽等村落及这些村落的出现昭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元代以“沽”为通名的地名在明代被传承和发展;二是元朝虽有大直沽、小直沽和三叉沽等,但仅局限于今天津市区内大约10里的很小范围内[见图1(1)],而明洪武时期新出现的沽村落距离直沽较远,扩大了沽村落的空间范围,是“七十二沽”村落群成长的重要标志。

(四)“七十二沽”村落群初步形成:明永乐大移民之历史机遇

自金朝建立直沽寨到永乐前约200年内,以“沽”为名的村落数目只有十几个。而在明永乐年间,以“沽”为名的村落增加了40余个。为何增长如此之快?首先,永乐年间为捍卫京畿安全、尽快恢复河北等地的农业生产,朝廷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移民,当时海河下游和蓟运河下游一带地势低洼、人烟稀少,是移民的地区之一。其次,另一些沽村落是随明成祖北伐的民丁留在当地定居所形成的。《明通鉴》中就有征用民丁运粮的记载:“永乐十二年正月辛丑:发山东、

① 参见张毅:《明清天津盐业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7页。

② 《明史》卷40《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892页。

③ 参见津南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修:《天津市津南区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79页。

④ 参见朱振周:《咸水沽小考》,《津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第256—257页。

⑤ 刘志强、张利民主编:《天津史研究论文选辑》(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64页。

⑥ 参见谭汝为、刘利祥:《天津地名故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6页。

⑦ 参见刘茂国:《天津七十二沽》,第1—63页。

山西、河南及凤阳、淮安、徐邳民丁十五万运粮赴宣府。备亲征也。”^①

海河沿岸、宝坻县和宁河县临近沽河的居民依赖于沽河而生存，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与沽河密不可分。直沽、三叉沽、葛沽和咸水沽等都是因沽河而建立的村落，又都欣欣向荣、名声远播，也为新的移民所知晓，并纷纷仿效而将新村落叫做“沽”。因此新的“沽”村落爆发式增长，加快了以沽为通名的“七十二沽”村落群的形成。^②“七十二沽”村落多数建于明朝，少数建于元代和清代。

永乐年间大移民新建的“沽”村落正史记载甚少，从当地的村史和传说中可获得这些“沽”村落建村年代及其移民来源等信息。如：宁河县的北涧沽，明永乐三年（1405），山东李姓一家来此建村，定居曾口河北岸，当地居民称河为涧，曾河口与蓟运河汇合处为沽口，故取村名北涧沽。海河沿岸的宁车沽，永乐年间山东张姓逃荒到此，因道路泥泞，车轴断，就地落户，初为拧轴沽，后改为宁车沽。宝坻县的清白沽，明永乐年间，山东姜、张二姓迁此定居，旁有普旧河沽口，以取“张、姜二姓办事清白”之意，得名清白沽。^③

笔者参照1995年版《天津百科全书》“七十二沽”记载，绘制了天津及周边地区以沽为通名的主要村落分布图，如图1、2、3所示。图中的行政区划参照2005年出版的天津地图册。图1（1）中带括号的三叉沽、直沽和小直沽是历史上的沽村落，已不在“七十二沽”之内。所谓七十二之数，是表示众多之约数，在各个历史时期，其数值亦各不同。由图可见，“七十二沽”村落主要分布在直沽河（海河）、东沽河以及宝坻县的八门城地区，正如陈铁卿所说：“天津之所以有众多村庄以‘沽’名，是因为均分布于沽河周围。”^④

结 语

“七十二沽”村落群反映天津亲水地名文化特征，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沽村落群的形成，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而是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等综合作用的结果。“七十二沽”村落群在各历史时期的形成原因及特征各有不同。金朝为保障通往中都的大运河运输安全，在沽河的三汉口建立军事据点“直沽寨”，是“七十二沽”村落群之肇始；元朝时，由于海运和盐业的发展而出现三叉沽、大直沽和小直沽等地名；明洪武时期，为恢复经济，加之海运、盐业和农业的恢复与进一步发展，催生了咸水沽、葛沽及一些其他沽村落的出现，推动沽村落空间范围的扩大，是“七十二沽”村落群形成的重要节点；明永乐大移民促进了沽村落的快速发展，并初步形成“七十二沽”村落群。关于“七十二沽”村落群仍有一些问题需深入研究，如为何西沽河沿岸没有沽村落，最早的直沽寨到底在何处，沽村落的空间布局等。继续研究“七十二沽”村落群的形成历史对梳理天津沽文化历史根脉、弘扬天津沽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附记：南开大学张春平教授为本文提供了一些资料和帮助，特此深表感谢。

（作者单位：国家方志馆；南开大学滨海学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参见夏燮：《明通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48页。

② 参见刘茂国：《天津七十二沽》，第229—264页。

③ 参见郭凤岐主编：《天津区县年鉴》，方志出版社，2002年，第507—634页。

④ 陈铁卿：《释“沽”》，《新晚报》1956年11月9日，第3版。